

# 中国近代社会公平思想初探

付强

(西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公平是历代社会下层民众及有识之士追求的目标,即使是内忧外患的近代社会也不例外。无论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抑或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无不以追求社会公平为己任。近代社会的公平思想为后来中国社会公平思想的追求起到了奠基作用。

[关键词]近代社会;公平思想;孙中山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0-0008-03

身处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再度回眸近代那段黎明前的黑夜,通过冷静而理性的分析,发现去除战争和宗教狂热之后,公平思想的发展轨迹清晰可见,而这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当代社会的现实,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公平是世界各国走向近代进程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公平这一概念而言,它是指一个社会中

的人们均衡合理地处理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态度和方式,它的核心意义是均衡和合理,即一个社会与其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均衡协调相处的状态和方式。换言之,公平是一种不偏不倚的原则,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中,在政治、法律、道德伦理等关系上社会与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之间(包括个体、团体)追求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在经

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这些灾害对当时的居民和汉政府的影响总体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导致人口锐减,流民大增。地震灾害导致大规模人员伤亡,能印证这一点,以上五次强烈地震没有表现出流民问题,但在《汉书》和《后汉书》关于其他地方地震灾害的记录中均有流民现象存在,河西四郡的地震灾害也应该有此现象存在。二是破坏了经济的正常发展。自然灾害对社会财产的破坏非常大,大量的房舍、城郭被毁,大量的牲畜死亡,又耗费无法计算的物资去赈灾救灾,增加了国家投入成本,对当时的经济破坏是巨大的。三是导致社会动荡。汉安帝永初三年

(109),“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sup>⑩</sup>说明因为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河西地处边塞,在较短的时间内赈济灾难无法到位的情况下,极易导致社会秩序动荡。两汉政府为了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也采取了多种措施,在简文四中记录了因为干旱敦煌地方官员倡导居民种植抗旱农作物,地震造成房屋、城郭倒塌,政府出资异地重建。自然灾害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是永远回避不了的问题,主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条件、人们防灾意识等诸多因素影响,这也是受灾害产生巨大损失的客观原因。

## [注 释]

李辉:《试论两汉时期自然灾害的特征》,《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凉州刺史部),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987年版。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见百度百科词条。

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

王子今:《两汉沙尘暴》,《寻根》,2001年第5期。

《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本文所选悬泉汉简释文均出于此。

谢毓寿、蔡美彪:《中国地震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⑩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⑪范晔:《后汉书·孝安帝本纪》,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

济物质利益关系上,给予一定范围内社会成员以均衡的条件和机会,如均衡地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拥有平等的手段参与平等的竞争,而后实现竞争结果——财富与收入分配上的均衡、公正和合理等。”这一定义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并非如此明晰,它经历了一个逐渐明朗化的过程。早在战国末年或稍后的《礼记·礼运》篇中,就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理想模式初步表达了模糊的公平理念。

这种公平理念显然无法在君主专制的中国社会中得到充分发展。实际上,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思想家们虽然对公平思想屡有涉及,但总体而言,都没有超出《大同篇》的高度。直至清朝末年,中国紧闭的大门被西方的大炮轰开以后,外国思想开始渐渐渗透进来,而真正吸取西方的公平理念并将其应用于现实政治实践中的第一人非洪秀全莫属。洪秀全在《厚道求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作品里提出:“遐想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尚德。尧舜病博施何分此土彼土……盖实见夫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并提出了“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社会。在《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女,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也。”从其革命的规模、影响来看,的确道出了当时中国人民的愿望。因此,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宁愿拼死相搏也在所不惜。因其农民阶级意识形态所限,这次革命洪流以失败告终,但它留下的宝贵思想为后来进步阶级实现全民族的平等、解放提供了依据。

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改良主义代表的康有为,其公平观集中体现在《大同书》中,他提出“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的主张。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人人皆须工作,不许不劳而

获,“禁悚懒惰”被悬为“大同世界”四大禁之首。“民生有勤,勤则不匮,此大同之公理”,否则“百事隳败,机器生锈,文明尽失,将至退化”,“故不作业不出力之人,公众所恶”。康有为认为,“大同”世界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一己之私”,“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在这个社会制度中,“无贵族、贱族之别,人人平等”,并且从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描述。康有为提出大同学说的目的在于救国救民、实现社会公平。在他的理想方案中,既有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社会的内容,也有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子,本质上是对传统公平理念的一种突破。

孙中山的公平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描述中,他说:“鄙人对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利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公有,而收其利。”这样的社会中人人平等友爱,社会成员的生老病养皆有充分的保障,他说:“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人民平等,虽有劳心劳力之不同,然其为劳动则同也。即官吏与工人,不过以分业之关系,各执一业,并无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孙中山的公平思想实际上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他所主张的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反对压迫和剥削群众,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方案。

反帝反封建是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起因,与太平天国面临的时代主题相比,这场农民战争与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农民战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声讨,要求平均地权,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因此,他们的平等理念表现为对《礼记·大同篇》的放大或手段更为激烈,影响的时间和范围更为久远和广大,表达了农民阶级平均地权的愿望,同时也是对封建剥削残酷性的映照。从其革命对象来说,他们的矛头指向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当时还没有像义和团运动或者后来的辛亥革命那样矛头指向两处,即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势力,因此,革命单一的对象规定了革命性质和其社会公平思想。

虽然洪仁玕的《资政新篇》给近代农民革命提供了一条摆脱封建羁绊、继续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它的先进性充其量只不过是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气息而已。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在作为革命主

体的农民阶级那里,并没有迫切的要求。时代的主题从一开始将《资政新篇》中萌生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消解了。相反,发展资本主义愿望在资产阶级改良派那里要求更为迫切。当时的中国身处帝国主义瓜分的狂潮之中,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帝国主义列强无极的贪欲之间彼此推长,中华民族的独立性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丧失殆尽,时代主题从一极变为两极,即从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反对外国侵略和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但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那里,更迫切的是改变中国的半殖民状态。因此,“中体西用”的治理模式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致观点。

严复从进化论角度指出,国人不应自甘劣等民族坐待而亡,而应该赶快起来进行奋斗,“要当立不反,出与力争,庶几磨砺玉成,有以自立,至于自立则彼之来皆为吾利,吾何畏之”。这一号召给了当时中国人以振聋发聩的启蒙影响和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立即成为当时正涌现的新兴知识分子革命派的重要精神食粮,煽起了他们救国图存的爱国热情,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一心想借助一个软弱的皇帝,力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的改良派,由于其自身来源的复杂性以及对两千多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的错误估计,他们实现民族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愿望最终归为泡影。康有为对未来公平社会——大同社会的设想因其阶级局限性而藏于密室,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反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民族独立与平等的任务最终没有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实现,资产阶级革命派承接过这种历史主题继续追求。

在19世纪90年代的兴中会宣言中,孙中山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吾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多,蚕占鲸吞,已见效于接踵,瓜分豆割,实堪虑于目前”,“为免奴隶于他族”,“特集志士于兴中”,为救国而革命,为进行武装起义,用暴力推翻满清政府,是源起于要求改良而可得的必然结果。孙中山最早指出了这条道路,正像李大钊在几十年前指出的那样,孙中山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民经济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促传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干净。他提出的“三民主义”以及后来的“新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他要承担的历史责任。对于“三民主义”,孙中山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来解释和规定,他认为,民族主义对自己的民族来说就是争自由,对别的民族来说就是平等和博爱,也就是相互支持和帮助。对国内各民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强调“五族共和”,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两方面有了更大发展,一则是民族自救解放,二则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作为反对传统的等级制、世袭制的思想武器,自由、平等、博爱的提出,对于在政治民主上实行“五权宪法”,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和土地所有制上采取“平均地权”的种种政策设想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近代史上这三种理想社会中的公平思想,由于无法解决社会的根本矛盾,因而不可避免地流于空想,但它们作为中国人民追求公平社会理想向现代社会理想的中间环节,为社会主义者进一步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思想经验。

#### [参考文献]

- [1]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简明读本)[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 李强.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社会学者对社会的警告[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
- [4] 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 [5] 熊月之.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和谐社会[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 [6] 严书翰.社会主义和谐理论研究五题[J].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5,(2).
- [7] 雷弢.社会公平的主观认定[J].社会,1988,(2、3).